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
CASS Seri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

——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Gender Preference and Sex Selection:
Research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of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张丽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
CASS Seri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

——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Gender Preference and Sex Selection:
Research on the Sex Ratio at Birth of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张丽萍 著

藏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

张丽萍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611 - 5

I. ①性… II. ①张… III. ①少数民族—性别—人口—
构成—研究—中国 IV. ①C924.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527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衡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
CASS Seri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
CASS Seri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vestigation & Research

编选委员会

主任 李培林

副主任 马 援

成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岚 王子豪 王延中 邓纯东 李 平
陆建德 陈 甦 陈光金 张 平 张车伟
张宇燕 高培勇 黄群慧 潘家华 魏后凯

前 言

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由于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和风俗习惯的特殊性而具有其独特的研究意义，本书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作为生育转变中性别偏好转变为性别偏好行为的直接后果来看待，并分析部分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历史与现状，采用人类人口学方法，从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的视角对村寨的性别偏好原因以及后果进行分析。

第一，运用孩次性别递进方法衡量不同民族的性别偏好，以及偏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提高造成的影响。同时利用中国的历史数据以及其他国家的数据，研究现代性别鉴定技术出现之前或在无比较严重性别偏好条件下孩次性别递进指标的分布规律。从美国的两次普查数据可以发现，美国的纯女户的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纯男户的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这与中国1990年和2000年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纯男户和纯女户孩次递进性别比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性别偏好行为严重程度的指示性指标。

第二，根据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运用母子匹配法构造不同年份妇女的生育孩次递进状态，发现汉族纯女户的孩次递进性别比是1980年开始上升的，而苗族受样本量影响，数据波动很大，但总体趋势是从1992年以后纯女户生育下一孩的性别比急剧上升，性别选择行为显现。

第三，女婴漏报是造成统计数据不实的原因之一，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民族的低龄人口漏报确实存在，漏报、民族成分变更等因素造成一些民族的低龄人口数据质量存在性别差异，而且这一差异在不同民族间明显不同。

第四，对村级数据的核实结果显示，漏报受人口流动、出生时间、孩次、性别以及是否超生的影响。在乡镇一级，数据质量受不科学和不合理的计划生育考核指标的影响，基层干部在数据产生的机制上作文章，出生人口数据经过村级漏报、乡级的“加工”，真实的数据向计划生育考核指标靠拢，尤其是在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考核指标以后，导致性别统计数据失真。所以，出现出生性别比数据上的平衡是必然或无奈的选择。

第五，根据马文哈里斯的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分析生育转变与出生人口性别比提高之间的关系，得出：一方面，人口再生产与生产之间产生的矛盾，会迫使人口再生产的方式加以改变，降低出生率，不过这一过程是缓慢的，而计划生育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加速，但这一加速转变过程并没有改变社会文化系统的其他部分来降低性别需求，反而因为生育数量限制加速了性别选择。另一方面，从基础结构决定论来看，受生产方式这一基础结构的限制，受地理位置偏僻、受教育水平较低及语言沟通不畅等影响，生计方式变化很小，家庭与文化中的性别需求缺少改变的契机。

第六，就家庭而言，在基础结构提供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性别偏好的形成有其必然性。苗族典型的父系财产继承保证了家族内的财产在自己的房族内流转，而不会被外嫁的女儿带到丈夫的家族内；无亲子的财产继承，在习俗上也是在父系宗族中确立继承人。作为女儿，在以家族为单位的家庭中，父母以嫁妆的形式使她参与了家庭的财产继承，在父母去世后以抬猪、送水来完成孝道。而在现实生活中，其与娘家的日常交往是以“客”的身份出现的，无法参与父母的养老。因此，“守屋”、继承、养老都对儿子产生了需求，同时家族继承的负面影响也刺激了这种对男性的性别偏好。

第七，与社会的人口再生产相对应，家庭也同样存在着人口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有其性别结构，在生育转变之前是通过多生来保证生育儿子，但在生育转变发生以后，保证有一个儿子出生是满足家庭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前提条件。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一儿一女、保证儿子是家庭规模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满足了家庭中继承、养老等需求，实现世代接替。而通过人为选择改变自然生育状况，势必会改变自然规律，改变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分布，使性别偏好转化为性别选择行为，进而导致宏观

的出生性别比偏高。

第八，文化和经济上对男孩的需求使那些没有儿子或者是极有可能没有儿子的家庭想尽各种办法要得到一个儿子，如 B 超选择性流产、产后性别选择，同时逃避计划生育手术等，并通过“架桥”“背孩子”等使性别选择在伦理上合法化。

第九，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实践上存在一定困难。从 M 寨来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各项措施，利益导向机制的刺激作用对依靠子女养老的当地村民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解决养老问题、改善双女户的生活，这既是对计划生育户的直接帮助，也可以起到一种示范作用。而提高住院分娩率在当地的自有医疗体系和观念下还需要在经济上和观念上进行考虑才有可能实施，进而才能降低溺弃婴的比例。而已经显现的男性择偶难引起当地村民的重视，期望在未来能够对改善性别偏好发挥作用。通过城市化把寨子中的人从熟人社会和现有的继承体系中解放出来，就目前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1)
第二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性别偏好的理论分析	(14)
第四节 性别偏好转化为性别选择的分析框架	(22)
第五节 资料来源、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29)

上篇 出生人口性别比状况

——来自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第二章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基本状况	(45)
第一节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区域差异研究	(45)
第二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民族差异	(55)
第三章 生育转变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65)
第一节 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转变	(65)
第二节 生育水平下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影响	(79)
第三节 生育意愿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87)
第四章 少数民族孩次性别递进研究	(93)

第五章 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质量分析	(104)
第一节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低龄组漏报情况分析	(104)
第二节 以村寨调查计生档案资料的核实看 人口数据的产生过程分析	(112)
本章小结	(121)

下篇 性别选择与性别偏好

——来自田野调查的分析

第六章 M 寨基本情况与性别偏好判断	(125)
第一节 Q 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125)
第二节 村寨基本情况	(129)
第三节 M 寨人口状况与性别偏好分析	(134)
本章小结	(142)
第七章 基础结构、性别需求与突变式的人口转变	(144)
第一节 男性的主导地位由生计方式与经济水平决定	(145)
第二节 生育水平的下降是在外部力量强制之下发生的	(156)
第三节 相对封闭的环境没有带来改变性别需求的契机	(169)
本章小结	(171)
第八章 家庭经济、继承方式、舆论压力与性别偏好 ——结构与上层建筑中的影响因素	(172)
第一节 财产继承、养老与性别偏好	(173)
第二节 嫁女与娶妻的成本对比——经济角度的思考	(189)
第三节 “男主女客”的性别定位与日常往来——亲属 关系格局	(194)
第四节 儿子、女儿的意义与生育意愿	(200)
本章小结	(209)

第九章 性别选择途径

——性别偏好的实现 (211)

第一节 求子的策略:求祖宗、搭桥、背孩子 (211)

第二节 丢“卒”保“车”:选择性人工流产、
溺弃婴与收养 (218)

第三节 现代技术下的性别选择 (230)

本章小结 (236)

第十章 破局之举

——降低性别偏好的举措与效果 (237)

第一节 住院分娩与接生婆接生 (238)

第二节 利益导向与女儿养老 (241)

第三节 人口流动及影响——外出的人口的目的
还是为了回家 (248)

第四节 择偶难促进性别偏好的改变 (250)

本章小结 (256)

第十一章 主要结论、可能贡献与不足及若干研究议题 (258)

第一节 主要结论 (258)

第二节 可能贡献、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60)**参考文献** (263)**后记** (277)

第一章

导 论

合理的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由于生育政策的特殊性和风俗习惯的特殊性而具有其独特的研究意义，本书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作为生育转变过程中性别偏好转化为性别偏好行为的直接后果来看待，并分析部分民族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历史与现状，从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的视角对村寨的性别偏好原因以及后果进行分析。

本章将介绍本研究的缘起，并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状况及分析性别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和分析思路。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贯主张各民族共同繁荣。“人口兴旺”政策成为促进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60多年来，全国各民族和谐、团结、稳定发展，少数民族人口总量迅速增加。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人口规模由1953年的3401.38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11379万人，人口总量增长了3倍。相应地，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由1953年的5.89%提高到2010年的8.49%。

虽然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少数民族人口的繁荣与发展更需要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合理化。由于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少数

民族人口的发展明显有别于汉族，形成具有鲜明特点的人口群体，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经历了由“多生多死，甚至少生多死”的人口停止增长甚至不断减少的状态到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①，人口转变历程明显落后于汉族。第二，少数民族的人口政策具有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制定了扭转民族人口下降、发展民族人口的“人口兴旺”政策^②，特别是1973年以来少数民族实行的较汉族宽松的生育政策：1000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与汉族基本相同。1000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其农业人口可以生育两个，还有一些边远的牧区及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可以生育三个孩子，对部分民族没有数量限制。例如，在西藏，把少数民族分成几种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一是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职工，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允许生育二胎但必须间隔3年以上；二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也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允许生育二胎，但没有生育间隔的规定；^③对少数民族农牧民西藏未限制生育数量。所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生育政策是不同的。在这种特殊的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低于汉族。第三，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全国55个少数民族分散在全国各地，但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分布较为集中，县级或乡村级的聚居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少数民族的上述主要特征不仅决定了少数民族今后发展的进程，也决定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因此，研究少数民族人口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人口的和谐发展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合理的性别结构就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之一。

自1984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长达30多年。人们一直关注着占总人口90%以上的汉族，而对超过1亿、占总人口8.5%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少数民族会不会像汉族人口一样，与全国的整体变化趋势相同并产生比较严重的出生性别比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① 张天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及其转变》，《人口与经济》1985年第5期。

② 同上。

③ 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

一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够为遏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目前，关于1984年以来长达3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后果的严重程度和今后如何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的势头需要采取哪些相应政策、措施成为研究和决策的焦点、热点和敏感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存在和恶化，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环境等一系列原因和背景。应对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也不是靠单一手段和措施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因此，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问题的深入研究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既要研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历史原因，更要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刻理解。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婚姻市场挤压和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调问题，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婚姻半径很小，择偶范围有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区域差异和区域不平衡问题将使出生人口性别失调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出生人口性别比带来的严重后果不仅是人口数量的不匹配，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

二 通过对少数民族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现象的分析，对生育转变中数量下降与性别失衡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是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现的，从与生育水平下降的关系来看，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快，另一个是生育水平下降到一个较低的程度。生育水平急剧下降，在这一过程中生育观念并未发生相应转变，尤其是某些民族存在较强的孩子性别偏好，例如，重男轻女，这种生育观念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发生转变^①。而生育转变理论强调的是数量变化，对于数量变化与性别

^① 张丽萍：《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5期。

偏好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进一步分析。

研究表明，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到2左右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升高^①。就汉族而言，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2。而有些民族的政策生育率为2，通过对这些民族的分析，有助于分析生育的数量下降与性别偏好之间的关系。

三 对不同习俗、不同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民族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性别比问题产生的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持续时间之长、数值之高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探讨。对于性别偏好产生的原因与性别选择的实现过程的深入剖析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在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角度来探讨儒家文化对男孩强烈渴求的原因时，加强对具有不同文化与习俗的少数民族的生育文化的研究，分析其出生性别比的产生机制，对未来解决这一困局可提供一定的参考。

四 运用人类学理论分析人口学问题，以文化唯物论的研究视角分析少数民族村寨及家庭中性别偏好及其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性别偏好。性别偏好的存在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性别选择也是文化选择。我们可以将人类学方法同人口问题结合起来，从村寨角度看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和后果，并通过实地参与观察，对数字背后的原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笔者以文化唯物论为分析框架，分析社区、家庭层面的各类因素对于性别偏好产生的影响，结合具体民族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定性研究增加定量资料的解释力，来深入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深层原因。

^① 张丽萍：《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人口与经济》2006年第5期。

第二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现状

目前,关于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历史与现状、升高的原因、后果、治理的政策建议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研究方法等方面。

一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现象产生的背景与原因

1955年10月,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手册)》中认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则男婴出生数为102—107^①。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的值域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在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三个阶段,即发现问题、探讨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全面分析。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发现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高于正常值。20世纪90年代关于出生性别比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出生性别比是否升高,到底是“实高”还是“虚高”。而2000年人口普查则结束了对出生性别比是否偏高的争论,目前已经没有人怀疑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事实。

(一) 生育转变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研究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是伴随着生育转变的过程而出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往往会在这样的人口中出现:社会经济正在发展之中,生育率经历了急剧的下降,但强烈的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依然存在,而人口政策和人口工作几乎全部集中于以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

^① The United Nation, 1995, Methods of Appraisal of Quality of Basic Data for Population Estimates Manual.

生育率下降上”^①，而“当那些传统观念及封建意识的更新和变革落后于现代科技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转变时，出生性别比的上升将是生育率下降过程中必定会产生的人口学现象”^②。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东亚、南亚国家或地区都普遍存在，如韩国、新加坡、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很快，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6.33下降到1.41；新加坡从5.99下降到1.36；香港从4.72下降到1.00。而同一时期，韩国的出生性别比从108上升至112以上；新加坡从108上升至109以上，然后又回落到108上下；香港从106上升至109。出生性别比均随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偏高或升高的迹象^④。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于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80年代末期的33%上升到1992年的82%。而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且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同一时期的两种现象发人深省，涂平认为出生性别比失常是中国和其他一些性别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⑤。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如前所言，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乎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方面。中国能将生育率稳定在现在这样一种低水平，计划生育工作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任何收益都有代价，

① 顾宝昌、罗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和韩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比较分析》，《人口研究》1996年第5期。

② 贾威、彭希哲：《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出生性别比》，《人口研究》1995年第4期。

③ 陈泽：《韩国的出生性别比状况研究》，《人口学刊》1996年第5期；Park C. B. and Cho N. H., 1984, Estimating the Excess of Birth due to Preference for Sex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Health Studies*, 4 (1); Das Gupta, M., and P. N. Mari Bhat, 1997, Fertility Decline and Increased Manifestation of Sex Bias in India, *Population Studies*, 51.

④ 原新、石海龙：《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研究》2005年第3期。

⑤ 涂平：《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问题探讨》，《人口研究》1993年第1期。